

湖湘

主编 方克立 陈代湘 (执行)

湘学史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库



車



主编 方克立 陈代湘（执行）

湘学史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湘文库
乙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黄楚芳
委 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黄一九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序

方克立

1998年9月，我在参加湘潭大学40周年校庆活动时提出了成立湘学研究所的建议。当时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考虑到湘潭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除了要增强整体实力之外，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而湘学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地方学术传承，湖南地区的学者对它进行研究，具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事实上湘潭大学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已有了较好的研究基础。二是考虑到湘潭本来就是湖湘学派最早的发源地，在湘潭大学建立湘学研究所有历史和地缘的根据。从南宋建炎四年（1130）胡安国父子在湘潭创立碧泉书院，到乾道元年（1165）刘珙重修岳麓书院，聘请张栻为主教，30余年间碧泉书院一直是早期湖湘学派的学术和教育中心，其在湘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应该受到历史的尊重。

开展湘学研究必须对这个学科有一个准确的定位，首先必须解决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等问题。我在这里把自己的一些初步想法提出来，与学界同道共同探讨。

“湖湘学”、“湖湘文化”与“湘学”

在湖南地域文化研究中，过去曾用“湖湘学”、“湖湘学派”、“湖湘文化”、“湖南学”、“湘学”、“潭学”等概念来说明这门学

问的性质和特征。事实上这些概念所标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属于不同层次的学问或学科。我们可以将这些概念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湖湘学”。它是指南宋时期与朱熹的“闽学”、陆象山的“江西之学”、吕祖谦的“婺学”大致同时代的，以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的，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的一个主张“体用合一”、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理学学派。它的名称实际上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朱熹给取的，在《朱子语类》和《文集》中，常有“湖湘学者”、“湖南一派”、“湖南学”之类的提法，后来黄宗羲、全祖望等人编纂《宋元学案》时即沿用了“湖湘学派”的名称。这个学派在南宋时期的阵容和影响相当大，南宋后期的理学家真德秀曾指出：“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黄宗羲也认为：“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为这个学派就专门列了六个学案，即《武夷学案》、《衡麓学案》、《五峰学案》、《南轩学案》、《岳麓诸儒学案》、《二江诸儒学案》，为该派学者个人列传的有数十人之多。但至南宋末年，这个学派已呈衰微之势。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陷长沙，湖湘弟子“荷戈登陴，十亡其九”，此后这个学派就不再称闻于世了。“湖湘学”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学理和学派概念，它所指称的范围是明确的、有限的，虽然后世湘学都曾受到它的深刻影响，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连船山学都不能包括在“湖湘学”的范畴之内，更不用说近世湘学了。

第二个层次是“湘学”。我没有考证过这个概念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从接触到的有限文献资料来看，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已被广泛使用。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

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这里“湘学”是指船山学。船山学无疑属于湘学，是湘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它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被当作一个标示湖南地区的学术传承的学术思想史概念。戴德诚说：“三闾以孤愤沉湘，元公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①这是以屈原、周敦颐为湘学发展史上的两个开创性人物。前者为文学巨匠，后者为理学开山，二人相去千余年，象征着湘学发展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叶德辉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②他甚至把湘学的源头上溯到了被封为楚祖的鬻熊，但重点是表彰宋明时期的周敦颐和王船山。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钞》中记载：“焕彬自长沙来信，极论湘学渊源，上自船山，下逮曾文正、郭筠仙，今之湘绮、葵园……洋洋十余纸。”叶德辉，字焕彬，他在此信中论湘学又把重点放在了船山以后的近代湘学上。古代湘学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情况也是极不平衡的，宋以前虽有一定的学术思想上的连续性和地域共同性，但却没有明显的传承统绪；具有比较严格的学理意义和学术传承意义的湘学实际上始于宋代，胡安国父子开创的湖湘学派才使它成为一种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全国性影响的地域文化，唐宋以前相对落后的湖南也一跃而成为后来的“理学之邦”。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在宋初的影响本来并不大，只是由于胡宏、张栻、朱熹等人的大力推崇，他才获得了“道学宗主”的地位，并成为湘学发展史上的一位象征性人物。20世纪40年代，湖南大学教授李肖聃著《湘学略》，即以《濂溪学略》为第一，接着才讲胡安国开创的湖湘学派，朱熹和王阳明在湖南的影响，王船山的贞晦深沉之学，一直讲到近世湖南诸贤在学术和事功上的贡

① 戴德诚：《湘学类纂·湖南宜善守旧》。

② 叶德辉：《郇园书札·答人书》。

献。因此，广义地说，湘学史就是湖南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史，特别是宋以后的湖南学术史，湖湘学派倡导的理学精神和务实学风一直贯穿于其中。由于湘学还是属于“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其下限大致地确定在清末民初之际，湘学精神的现代转换与改造就具有新的时代涵义而不属于传统湘学的范畴了。

第三个层次是“湖湘文化”。这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的概念，不仅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的内容，而且包括民风、民俗、民族心理等所谓“俗文化”，甚至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历史遗存、江山胜境、湖南地区的土特产等物质文化的内容都包括在内。

以上三个层次概念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都不同。湖湘学是一个比较窄的学派概念，湖湘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大文化（广义文化）概念，湘学则居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是湘学的重要内容而后者并不仅限于湖湘学，它还包括船山学和近代湘学等内容。作为学术观念形态的湘学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所以有的学者又把它称为“核心湖湘文化”或“狭义湖湘文化”。在这三个互相联系、互相包含的概念中，我认为选择湘学作为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比较合适。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比较深厚的历史传统，作为一门思想性、学理性较强的学科，研究对象明确，学术内容丰富。湘学精神的继承和改造与现代化事业息息相关，我相信它一定会引起湖南省和全国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走向世界。

“湘中之学”与“湘人之学”

要准确地把握湘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还必须处理好“湘中

之学”与“湘人之学”的关系问题。

湘学是在湖南这个地方产生和传承的一种学术或学问，称它为“湘中之学”或“湘中学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湘中之学”并不一定就是“湘人之学”，湘学并不都是湖南人创造的。李肖聃《湘学略》的最后一篇为《流寓学略》，专门记载了非湘籍人士对湖南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他指出：“屈子楚人，非生于湘中，第被放至此耳。然流风所被，化及千年，此州之士，尽洗蛮风，登诸华琰。然后昌黎开南岳之云，子厚揽永州之胜，胡安国讲学于碧泉，朱、张宣道于岳麓。大贤所至，群彦景从，过化存神之妙，有非浅人所能共喻者。”这里反映的历史事实是，湖南在古代是荒蛮锢塞之域，直到唐朝还是安置贬官谪吏的地方，在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与民族融合中，先后受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才逐渐形成了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相对稳定并有历史传承性的地域文化形态。湘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国内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分不开的，许多非湘籍人士都为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最重要的关于“天”的哲学追问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回答，据传都是他们在被流放或被贬黜于湖南期间写作的，因此也是湘学史上的光彩篇章。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父子是福建人，其光大者张栻是四川人，但这个学派确实是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对后世湘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不能抹杀他们在湘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湘中之学并非皆是湘人之学，另一方面，湘人之学也不尽在湘中。走出湖南，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湘籍人士，他们在学术和事功上所取得的成就，能够体现湘学精神、继承和弘扬湘学传统的，是不是也可以包括在“湘学”的范畴之内，作为湘学研

究的对象呢？我认为是可以的。这表明湘学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是与整个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已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近代以来湖南人走出本省，在外省和全国范围内干事业的人多得很，他们中的不少人，接受的是湖湘传统教育，其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湖湘学统的深刻影响；他们在学术和事功上的成就，可以说正是湘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譬如清朝嘉道年间曾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的湖南安化人陶澍，其理学经世思想就直接来源于湖湘学统，并将其运用于整肃吏治和改革河工、漕运、盐政的实践，成为近代前夜著名的地主阶级改革家。陶澍改革成功的范例，又支持和促进了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汤鹏、唐鉴、邓显鹤、李星沅等一大批湖湘经世派人士的崛起，并对近代经世大吏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等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人的活动地域并不限于湖南，但其思想和行为都体现出了尊崇理学、经世致用、重视践履、关心国事等湘学的特点，因此不能否认他们也是近代湘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些近代湘学人物如郭嵩焘、曾纪泽、唐才常、陈天华、杨毓麟、黄兴、蔡锷、宋教仁、杨昌济等人已经走向世界，能够用世界眼光来考虑中国的发展问题。这也说明湘学并不将自己局限于一种地域文化，而是具有与时俱进、面向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品格。

走出湖南的湘人之学，当然也不能统统列入“湘学”的范畴，即使是人文学术，也要看其是否能接续湖湘学统，弘扬湘学精神，有独立见解，能“开风气以自名家”。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的《余论》中，专门回答了王先谦与王闿运并称“二王”，前者亦一时显学，成书数千卷，著籍弟子且千人，为何独以王闿运为湘学，而不以王先谦为湘学的问题。他说：“昔王益吾

(先谦)先生以博学通人督江苏学政，提倡古学，整饬士习，有贤声……然文章方、姚，经学惠、戴，头没头出于当日风气，不过导扬皖吴之学，而非湘之所以为学也……王闿运之人之学，老辈颇多绳弹，然有其独到以成其湘学。益吾先生，博涉多通，不啻过之，而无独到。”又说：“王闿运文章不为桐城，今文经亦非当行，然能开风气以自名家。益吾先生文章桐城，训诂休宁，无不内行入格，然不能名家。而在吾苏，则贤学政也，异日《江苏通志·名宦传》，必有一席。”这虽然只是钱基博的一家之言，李肖聃《湘学略》中就有《葵园学略》，仍给王先谦在湘学史上以一定地位，但钱氏所言乃治学术思想史之一般原则，亦应引起湘学研究者的重视，至少“二王”在湘学史上的贡献大小和不同地位是可以比较的。

从历史现象看，古代湘学并非尽为湘人之学，近代湘学倒是以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湖湘士人为主体的；古代湘学一般来说即是湘中之学，近代湘学则不一定为湘地所限。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湘学研究的对象简单地界定为“湘中之学”或“湘人之学”，而是要将二者适当地兼顾、结合，这样湘学研究的空间就大了，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

“湘学精神”与“湖南人精神”

关于湘学的意义，可以从不同角度、多方面来阐论，这里仅从其学术思想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略作说明。

一、湘学研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儒、道、佛诸多学派而以儒学为主体。宋

明理学是儒学的最高理论形态或完成形态，因为它完成了吸收佛、道的思辨哲学而给予儒家政治伦理的合理性以精致的哲学本体论论证的任务，也就是说，完成了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综合创新”。

8 宋明理学中有不同的学术派别，流行的观点是将其划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在哲学上将其划分为“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三派。这些观点都忽略了在宋明理学中还有对朱熹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后来又成为朱熹之论敌的，在黄宗羲看来“当时为最盛”的湖湘学派，忽略了在哲学上围绕着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理气、心性问题的，除了程朱的“理本论”、陆王的“心本论”和张载的“气本论”之外，还有以胡宏为代表的“性本论”一派。正如黄宗羲在评论朱陆异同时所说的，宋明理学中的各派实际上是“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它们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企图为儒家伦理的合理性做哲学论证的学术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也正如朱熹在给张栻写的祭文中所说的，他们二人是“志同而心契”，“同归而一致”。各派学术观点之异不过是在论证儒家伦理的合理性时，所采取的途径、方法、视角不同而已，其实相互之间有着很大程度的互补性。

作为宋明理学中重要一派的湖湘学派，由于曾经受到朱熹一派的严厉批评，而程朱理学后来又被历代统治者推崇为“正宗”，故前者在理学中只有“旁枝”的地位而不受重视，胡宏的“性本论”在哲学史上也没有程朱的“理本论”和陆王的“心本论”那样显赫的地位，甚至被其遮蔽而湮没无闻。但是，历史选择了程朱理学的结果，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是出现了“内圣强而外王弱”的情况，湖湘学者批评的那种“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学风发展到极端，甚至出现了“平居袖

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可悲局面。“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正统派理学的这种致命弱点，反而凸显了以倡导“体用合一”、心性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内圣与外王并重为特征的湖湘学的价值。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正统派理学，还是被贬为“旁枝”的这种“得其体必得其用”的实学，能更准确地体现“圣人之道”即传统儒学的真精神？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可谓慧眼独具，他在疏理宋明理学时，首先将这桩学术史上的公案翻过来，认为不是伊川朱子系，也不是象山阳明系，而是五峰戴山系，才真正继承了孔孟道统和周敦颐、张载、程颢所开创的理学“圆教模型”之真传。朱熹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性与情、存有与活动分裂开来，违背了“圆教模型”，所以不能成为宋明理学的嫡系，而是“别子为宗”^①。牟宗三的宋明理学三系说，大大提高了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在宋明理学、孔孟儒学以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为改变“湖湘学统为朱子所压服，后世无传”的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确认识和评价湖湘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对于湘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湖湘学统，亦即湘学之有“统”的真正源头。那些受程朱理学正统观念影响较深的学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如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的《导言》中，“上推周敦颐、王夫之两贤以端其趣”，极力表彰二先生在湘学发展中的贡献，而只字未提及开创湖湘学统的胡氏父子，以及南宋湖湘学派对近代湖南学风的深刻影响。在湘学人物中，王船山作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之集大成者的地位，以及他作为宋明理学之继承者和终结者的地位，可以说在 20 世纪已经基本

^①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第 35～52 页。

上得到确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亦为学界所公认，相对说来，南宋湖湘学派在宋明理学和中国思想史中应有的地位，胡宏的“性本论”在中国哲学史中应有的地位，至今尚未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牟宗三的“宋明理学三系说”还远不是学术界的共识。我认为这是目前湘学研究中，也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应该特别予以关注，重点加以探讨、解决的一个问题。

从周敦颐、胡宏、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到谭嗣同，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湘学传承，不仅学术内涵极其丰富，而且通过岳麓书院和湖南地区其他书院的师弟传授，使其有了学统上的连续性，表现出在学术思想上和学风上有某些前后比较一致的共同特点，形成了一种学术精神传统，深刻地影响了该地区的民风民俗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域文化或学术传统中是很少有的。关学、洛学、闽学、江西之学在宋明理学中都是“显学”，但学统深厚如湘学者，传至近代仍能以其“学”名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的，可能没有一个。在我国目前的地域文化研究中，徽学可谓一枝独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得到了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殊荣。但徽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与湘学有很大的差异，它是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的大量徽州文书为基础，并与典籍文献和地面地下文物遗存结合起来，研究徽州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它涉及徽商、徽州佃仆制度、徽州宗族、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徽派建筑、徽雕、徽州戏曲、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刻书等广泛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与“湖湘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约略相当而又各有特点。相对而言，专以湖南

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湘学，比徽学研究的范围要狭窄得多，也线索清晰和内涵确定得多。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史概念，湘学倒是与关学、洛学、闽学等比较接近而又有更长的传承历史。

湘学研究不仅在宋明理学史、中国儒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它对于中西文化比较与交流、中国教育史等学科的研究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二、湘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湘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但是湘学的精神传统却可以是活的，经过现代转换仍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服务。阐明湘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就是要解决湘学精神的现代继承、弘扬、改造和转换问题。

对于“湘学精神”的主要内涵，湖南地区的学者已经作过不少研究，发表了一些有理有据的、很有启发性的见解。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三大特点；有的学者认为湘学的根本特点就是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结合起来，坚持内圣修养与外王事功的统一；有的学者更加看重和突出湖湘学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有的学者还注意到了湖湘学统中有不囿成见、广征博取、兼容并蓄、宽厚大气的开放性的学术品格，等等。我认为这些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有助于我们对湘学精神的深入开掘和准确把握。

近代以来，由于湖南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聚焦的地区之一，

因此一直处于社会变革和政治风暴的中心，“近世湖南人才之盛，国中恐无出其右者”。陶澍、魏源等晚清理学经世派，曾国藩、左宗棠等发起洋务新政的湘军大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黄兴、陈天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几个重要人才群体的相继崛起，把近代湘学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近代湖南学风”也成为学者们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一方面十分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湖湘学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注意从湖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去探讨“民性倔强”的原因，以至有人专门提出了“湖南人精神”这个概念。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①

这里揭示了湖湘学风与其地理、“民性”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近代湖南先贤之所以能在学问和事功上取得巨大成就，新旧相融，问学殊途，“要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这也

^①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1页。